**1**

**消解和清理（ Déblayage）**

**1.1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拉康在加拉加斯[[1]](#footnote-0)**

1982年，在参加“弗洛伊德领域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Encounter of the Freudian Field）”时，帕特里克·科姆·霍根（Patrick Colm Hogan）了解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这并不是说他在大厅里撞到一个典型的神经症的或精神病，而是一个他亲眼所见的“案例”：其中一些人显然已经开始类似集体性（collective）谵妄的表现——任何有理智的旁观者都会觉得——现在一个狂人正现在控制着精神病院（asylum）：

*演讲者花了几分钟讨论某一案例的来龙去脉。然后他引用了拉康的一句非常抽象的、非常令人费解的话，是关于扭结的问题的。接着，他头顶的投影仪展示了几条抽搐的线条和箭头，演讲者随后就宣布道：“这就是症状。”他在总结时，发言说道，他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看过拉康对扭结的分析之后，就决定介入这一领域，并在几天的沉思后提出了一个问题。“结果是这样的，”——然后就是更多的箭头和重叠在黑板上闪过曲线。“...谢谢，”随之掌声一片。*

*当然，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确实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演讲者其实并没能好好解释他在这里所引用的、图形化的、插入的内容之间的联系，也有可能是上述案例的记述者压根没搞清楚状况。但是光是这一次会议上，类似以上描述的案例就比比皆是，而且他们中的很多对连贯的重构（coherent reconstrual）并不持开放态度。2*

为了达到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对临床解释的呈现其实本身就欢迎着进一步的理论重构，更无可能会抑制它——但这一想法本身不太可能说服那些对拉康精神分析持批评或矛盾态度的人，更不用说来让他们参与这类国际学术会议了。当然，历史上曾有人完成过对临床研究进行重新解构的壮举，毕竟，弗洛伊德纷繁的案例研究其实就已经保证了对这一庞大的解读行业的无限支持。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这一领域产生的最佳作品往往并不旨在建立或重新确认弗洛伊德作品中的理论连贯性，事实上，拉康事业的初衷，正是在原则上反对将弗洛伊德的文本转变为某种应该不加批判就接受下来的教条（doxa）。拉康对弗洛伊德文本中的前后不一之处加以研究，对文本断裂的认识刺激了新理论的产生，这反过来促成了更多的此类阅读。

弗洛伊德的文本除却易于理解之外，其实更有着一种欺骗性的“简单”，这在一方面使他的作品易于阅读，但也在另一方面也让他容易被过于仓促的理解所戕害。因此，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拉康试图避免重蹈弗洛伊德的覆辙——通过采用与他截然相反的文风。我们可以引用拉康于1973年在法国国家电视台节目上说出的，那句令他声名狼藉的开场白，来佐证这一点。一般人或许会认为，这次电视直播会是一个连贯地展示精神分析魅力并吸引新人加入的机会，但是拉康肯定不是这么想的：

*我，真理，在说话。不是全部[pas toute]真理，因为没有办法说出全部。说出一切真理是不可能的：人总是言不由衷。然而，正是通过这种不可能，真理才能抓住实在。*

*然后我会承认，我曾试图回应日前的闹剧，它只对废纸篓有好处。*

*那是一次失败，但因此...当其与一次反常相比时，实际上是一次成功...那种反常在于这样一种说话的想法，以便被白痴理解。3*

对拉康来说，真理和全部真理之间的区别是精神分析实践的根本。主体总是言说真理，但这是一个零星地宣布自己的真理:谐音和语法上的失误为逐渐限定主体实在的分析提供了素材——主体反复犯错的难以辨认的创伤性原因所在。一次成功的分析需要大量这样的有意图的（intentional）意义失误和交流失误。对理论连贯性的追求——换言之，试图阐释完整的真理，重新构建一种说明一切的，包罗万象的叙述——只会阻碍这种“不适”真正地被“彻底解决”。主体的无意中的妙语（Witz）形成了一个错误喜剧——一堆字母（letter，引用拉康特别喜欢的一个乔伊斯双关语），而不是一个完整真理的原子构件，只不过是垃圾（litter）——拉康对此的反应不是要产生一个连贯的理论重构，而是恰恰是要产生他自己的一窝“厕纸”（poubellication）。4

考虑到他对是否要在意清晰度和大众吸引力这一问题上所持有的怀疑态度，拉康无疑会欣赏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为自己的怪话所给出的辩护。拉康在电视上露面的前后几年里，随着水门事件的蔓延，尼克松向美国各地的电视观众也在发表讲话，尼克松利用了人们常见的一个误解来为自己做辩护，即，真相和清晰度是等同的，他经常会在撒谎之前说：“让我把一件事说得非常清楚。”“什么？”，巴特勒问，“‘透明’这个概念是不是本身就很模糊？5”可当一个人能够“被白痴理解”时，还有什么会是模糊的呢？值得一提的是，拉康在此更进一步认为：就算尼克松想，他也不可能说出全部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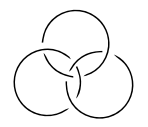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正如马尔科姆·鲍伊指出的那样，事情并不像连贯的弗洛伊德和语无伦次的拉康之间的对立所暗示的那样简单：

*弗洛伊德在表达他的观点时力求清晰，而拉康则蓄意含糊。但是，弗洛伊德为了不让自己看起来过于易懂而精心地使用了自我怀疑的修辞，而拉康则一边冒着让人根本看不懂的风险，一边又经常设法暗示，在他令人眼花缭乱的文体之下，有一种至高无上的不证自明在起着作用。6*

当然，霍根所厌恶的正是这种同时要求模糊性和清晰性的（二者不太可能混合在一起）的东西。在“来自拉康的令人费解的句子”之后，出现了各种大胆而明确的声明（“这就是症状…，且结果是这样的”），而在背景中，“文体”形成了一种明显纷繁而密集的编织；“抽搐”的箭头、曲线和扭结其实毫无意义。它们是这个叙述场景的脐（navel）；“引用”指的是恰恰是不可理解的模糊性和不可分割的支点，呈现的“图表”和“介入（intervention）”都是在这个层面上起着作用。如果案例展示的这三个要素之间的联系仍然模糊不清，那可能恰恰是因为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扭结的分析”是发生在案例之外的。

对于拉康后来的研讨会的读者来说，这或许是最恒久和最困难的问题，即这些缠绕的话语，扭结的图像和所谓的有效的精神分析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这并不是什么小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的大问题。

首次出现在研讨会XIX（1971-1972年）上的波罗米结代表了拉康所努力创造的精神分析拓扑的最后阶段——这是一个明确始于1953年的项目，他第一次提到圆环或“环”，伴随着一个挑衅性的论点，即这样的引用构成“不仅仅是一个隐喻，它体现了一种结构”7，一种通向结构的非隐喻途径：拓扑学的吸引力取决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要将三个圆环（tori）或“绳之环”组织成一个波罗米结，这耗费了拉康将近20年时间——它的基本属性是，由于它的两个环没有直接相连，它需要第三个环才能悬挂在一起：



**图1.1波罗米结（拉康对波罗米结的最早介绍是在研讨班XIX,9/2/72和研讨班XX, p. 124）**

*虽然这可能是一种有趣的娱乐，我们可能会从自己的绘画或建造中获得一点乐趣，但它似乎不足以解释拉康和一小群数学家多年来对它的痴迷研究。至于这个图像不是隐喻性的，或者说这个图像对精神分析实践有重要贡献的说法——嗯，这肯定是荒唐至极。*

对于拉康的许多读者来说，他对拓扑学的使用简直是走得太远了。戴维·梅茨格（David Metzger）完美地捕捉到了那些“建议我们不需要拉康拓扑之类的东西”的实用主义心态。“还记得菲勒斯吗？”他们告诉我们。“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解释清楚这一点。”“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谈论一些肯定会阻碍人们阅读这位重要思想家的东西呢？”8的确，何必费心呢？拉康对精神分析的拓扑化尝试从来没有完全摆脱过这样的名声：完全就是多余，完全就是不必要的自我放纵，拉康拓扑学已成为了拉康派晦涩性的最糟糕的体现。然而，拉康在他的整个事业中经常宣称拓扑学与精神分析之间不寻常的、不言而喻的相关性，而评论家们发现，在这一点上，即使不是更令人反感，也至少是令人不快的。正如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 Alain Miller）所说，对康德一个术语的故意偏离，肯定会激怒所有优秀的后结构主义者，“我们就代表了这种拓扑，因为我们就是在空间上操纵着它；有时拉康会给它赋予更多的价值，以至于显示出一堆结，并说：‘这就是物本身。’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似乎太过了。”9一个人怎么能像拉康那样指着一堆环，不仅声称这种奇特的编织是精神分析学科最合适的支持，而且还直接断言道它其实远远不仅仅是某种隐喻、图像或模型？——这让那些期望从这位大陆思想家那里得到更多后结构主义启发的焦虑不安的人们更加愤慨。

这本书的目的是探究为何我们应该费心了解拉康的拓扑结构。首先，我们必须解决那个拉康问向自己的问题，即，拉康拓扑学在试图回答什么问题？为什么必须以拓扑学的方式进行回答？

如果我们试图从任何明显系统和连贯的东西中寻找答案，如拉康拓扑学、精神分析理论的拓扑化或康德先验美学的革新，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建构。由于拓扑学对拉康来说不是一个要点、主题或概念，所以必须采用一种普遍的重新解构的手法；他没有像撰写研讨会或关于纪德（Gide）的写作（écrit）的评论那样，举办一场关于拓扑学的研讨会或给出某种“关于”拓扑学的评论。相反，它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支持，与他纷繁的话语结构打结在了一起。虽然我们通过用一些线索将拉康的零星斑块编织在一起，强加了一定程度上的连贯性，但这种连贯性也就仅限于此：拓扑学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它对不连贯性的形式化；它恰恰呈现了逻辑的僵局和结构的悖论。

事实上，如果修改鲍伊的描述，改成“至高无上的不证自明”将不再存在于“拉康令人眼花缭乱的文本之下”，因为这种结和环的非隐喻写作本身将是极其明显直观的（其精确度穿透了语言总是产生的不透明性，而语言无论多么简练都无法做到这点），那么以这种极其明显的方式呈现的结构本身，恰恰是那些不明显的东西。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无意识主体的结构有悖于基本的时-空区别（而这些惯常对自我来说是又是如此的明显）。拉康经常强调，他的拓扑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挑战了那些直觉（例如内在性和外在性之间的划分，我是什么和不是我的东西之间），这些直觉不仅是自我思维和自我理解的一种“品质”，而且恰恰也是自我意识的构成，是自我坚持的必要支撑。正是作为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和陌生的空间和动力学的写作，拉康拓扑学才达到了它的精确性，并且和根本的精神分析性颠覆产生了关联。

在研讨班XXIV上，拉康用带有同情的口吻指出“这些事情是非常不方便的（抑制的），甚至很难想象”10，来演示当一个人翻转一个由内而外与另一个圆环链在一起的圆环时会发生什么。这不是对心智能力的模糊提及；对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抑制具有精确的精神病理学意义。作为“想象界的命名”11的结果（即假设一个不可变的本体论统一是这个自我主体的‘专有名称（proper name）’或者，根据拉康的博罗米结（见图4.2），是想象界侵入象征界的结果（后者是差异能指的维度，当它们侵入实在界以创造一个症状作为主体本体论不统一的场所时，才产生一个“专有名称[proper name]”），抑制是一种自我强加的限制，用来保护虚幻的一致性。或者，根据拉康的博罗米结（见图4.2），抑制是想象界侵入象征界的结果（后者是差异能指的维度，当它们侵入实在界以创造一个症状作为主体本体论不统一的场所时，才产生一个“专有名称[proper name]”），抑制是一种自我强加的限制，用来保护虚幻的一致性。抑制本身不是一种症状（精神冲突的一种表现），而是对这种表现的回避。换句话说，这是精神分析本身的障碍。

我们可能会认为，对拉康拓扑结构的抵抗是一种相当狡猾的吸收反对意见的方法，这种方法让人想起任何质疑俄狄浦斯情结存在的人都无意中提供了神经症的压抑的证据。在这两种情况下，批评反倒证明了其有效性。因此，仅仅诉诸于不一致，诉诸于精神不便是不够的，它必须得到严格的补充。尽管如此，结构的书写还是必须要保持不同于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不同于自我立即理解的东西。

重要的是，精神分析学家的严谨不一定就是数学家的严谨。在我们继续之前，重要的是要声明，这本书（套用拉康关于升华的格言）并不是试图将精神分析提升到数学的尊严；它没有包含关于拉康提到的各种拓扑的数学史和应用的冗长论述，也没有试图使这些参考文献成为它们所不是的对东西——也就是说，在复杂性、发展性和精确度方面，这篇文章有效地取代了临床，并在数学领域（例如代数拓扑学）中与之匹敌。出于精神分析的考虑，拉康经常无视数学惯例。事实上，当被问到“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真的有必要学习拓扑学吗？”他回答说：“作为一个额外…，这不是（分析家）必须学习的东西。无论他是否知道这件事，…无论他是否知道这件事，…从他做精神分析的那一刻起，这就是他以之作切割（cut）...的东西（l’étoffe,织物）...（但是）如果他的拓扑结构是以错误的方式构建的，（它）将以他的病人为代价。”12拓扑学不是“额外的”，不是引入到精神分析领域的数学领域；它是固有的，任何错误都是精神分析学家而不是数学家的错误；它们不是以公式或证明为代价的，而是以病人为代价的。拉康拓扑学最关切的，正是精神分析上的错误。在努力填补拉康留下的空白或模棱两可，或者在给他的精神分析的“数学化”一个光鲜的完成之前，我们选择了一种症候性的解读，希望对他笨拙和扭曲的公式的密切关注将揭示一点，那就是拓扑学恰恰是那个被要求的呈现，而不是某种需要被解决的困难和悖论。

\*\*\*

有趣的是，除了霍根他对这“惊人案例”的描述外，他还观察到“当然，也有许多清晰而富有启发性的陈述，有些是引人注目的，比如雅克·阿兰·米勒的陈述。”13霍根的这两个“惊人案例”表明，这两种演讲占据了文体光谱的两端，虽然我们将把对米勒对“弗洛伊德领域”的贡献的更全面的研究留到后面，但值得简要指出的是，由伊丽莎白·鲁迪内斯科提供的被广泛接受的评估是，“米勒的理论还原理论（Miller‘s Thetical Reduction…）向广大公众表明，迄今为止被认为是封闭和模棱两可的作品实际上是相当连贯和严谨的。”14这最后两个术语之间推断的相互关系值得进一步关注，因为对于拉康来说，如果要避免这门学科成为勉强可信的巫毒教的话，那么培养精神分析的严谨性就是很有必要的，而同样的严谨性恰恰并不会导致产生某种属于新连贯主体的，连贯历史的解释。这，只是一个更严格的“坚持实在界”的问题。正如拉康经常提醒他的观众的那样，博罗米结不仅是由于圆环有洞这一事实而结合在一起的。他毫不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对结的实验不会预示着在精神分析领域里某种保证了理智的新黎明即将到来，他之所以进行结的实验，只是因为他有病罢了：“我有精神病只是因为我总是试图做到严谨。”15

鲁迪内斯科还生动描述了使拉康及其数学家朋友沉迷其中的狂热，他将他们的集体努力描述为“对绝对的追求”——他引用了巴尔扎克（Balthazar Claës）的《*La Recherche de l’Absolu*（一个男人的故事）》：在痴迷于寻找绝对的炼金术的旅途中，这个男人破费了大笔金钱，并且无视家人的劝阻一意孤行。然而，如果巴尔扎克浩如烟海般的《人间喜剧》中的这篇特别可悲的章节证明了以全部真理的形式完全致力于实现对知识的欲望的愚蠢的话，那么拉康渴望给他的读者和听众——那些要么是虔诚地，要么，就德里达来说，是批判地认为他是“真理的传播者”16——对“当前喜剧的回应”就是人类的状况，并不会变成为所有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灵丹妙药：“认知（connaître）的欲望遇到了障碍，而我发明了体现这种障碍的结。”17结的功能在此已明确确立：其远非等于作为精神分析理论的一部分来全面地综合和完成精神分析理论，恰恰相反，它被部署为了一种对无法理论化的理论的非表意（non-signifying）性支持。”

作为被鲁迪内斯科（Rudinesco）嘲讽为“博罗米多星人”的拉康追随者之一的拓扑学家皮埃尔·苏里（Pierre Soury）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描述：“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 这里的定义是 casse-tête （难题），casse-tête 是一个简单但无法预见的问题，其解决方案不易重复、不易被意识到、不易传播、不易核实。18“如果我们把苏里的客套话太当回事，把这些摆弄弦环的结果看作不过是比数独稍繁琐一丁点的智力游戏（casse-tête）的话，那么其实我们正冒着严重低估此类研究的风险。从问题到解决的过程并不是从不连贯到连贯的过程，而是一种有效的实践，那就是公正地对待这些“智力游戏（casse-tête）”“无意识之谜”19 ，而这种公正地对待本身可能并不是一个可重复的、可教导的、可验证的或可还原为有意识的知识。但是，它也不能成为某种形式上的魔法，它必须是严谨的。拉康终身都在努力克服这种双重束缚，这是他对精神分析思想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在与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富有启发性的对话中，鲁迪内斯科为拉康提出了另一个文学中的幽灵：*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 20。在他生命的尽头，拉康确实表现出非凡的放荡：在他身体机能每况愈下且沉默期越来越长之时（当然，后期拉康讲话间歇期越来越长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衰老），他解散了他的学派以及关于他思想的理论研究组织。如果这两个文学人物的结合看起来不协调——克莱斯（Claës）因为了解不足而遭受苦难，俄狄浦斯却因为他了解了过多的真相而承受痛苦——那么这正奇怪却充分地说明了就其对知识的贡献而言，评估拉康思想这一最后阶段的重要性的困难所在。拉康知道什么？这是我们向无意识提出的问题。 正如巴迪欧所指出的那样，在一段引人入胜的优雅文章中，“晚期拉康”——他对“智力游戏（casse-tête）”的“解决”，或者说，在对“智力游戏（casse-tête）”的回应中将“智力游戏（casse-tête）”本身所作的消解——本身已成为某种特殊的抵制的重新解构的智力游戏（casse-tête）：

*（拉康）把这个终止点（terminal），这个最终的瓦解，强加给任何听他讲话的人。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姿态在某些方面是晦涩难懂的。但它揭示和浓缩了主体的悲剧本身。不放弃自己的欲望说的是能够，且知道如何，去撤销你认为你已经做过的事情，并以一种紧凑的方式将二者捆绑在一起。晚期拉康首先明显是让人感到困难的，但他也确实以这种方式获得了卓越的和非凡的地位。*

*这就是他的死令我震惊的原因之一。众所周知，大师亦终有一死。然而，拉康之死被掩盖在奇异的光环中，因为它呼应了他自己的作品。他的死是以他晚期的思想为模型的，而这种思想恰好是在俄狄浦斯的指号（sign）下出现的，这个人物象征着一位老人的逝世，并向世界留下了他死亡的无法解开的谜团。拉康，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最后几年的沉寂和他的去世构成了他神秘的遗产的组成部分。二十年后，拉康的奥秘仍然存在。即使将拉康视为某种典范，我们也无法把他工作成果间的联系明确固定下来。我们将永远不会结束对这个人及其思想的审问。拉康思想到底是什么？精神分析？明显是。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某种当代写作，或者说语言大冒险？ 当然也算。一处关于主体性的戏剧？那也说的过去。那么还有什么？是否还有一些无法量化的剩余？拉康过去是，现在是并且永远是一个谜，他是一个无法分类和完全破译的作者。*

*…大家都熟悉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那句用以收尾逻辑哲学论的著名的格言：“where of one cannot speak, there of one must be silent.（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必须以沉默待之）”如果实在是无法被象征化的，那么归根结底这就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言说的东西；因此，必须保持沉默。但是保持沉默也总是意味着，这仍然是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去指示，去指出的义务。你必须展现那个使你必须保持沉默的存在。我想像已故的拉康会继续将自己的手指指向一个难以言喻的实在。最终，我们无法再知道这个手势在表示什么，和在真正地暗示什么了。它像死亡本身一样作为谜团留给了我们。21*

这里有一个“拉康的”实在——某种让我们与拉康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缺少更好的词）概念——然后才是*拉康的*实在，即他“不可量化的剩余”；显然，要说出他的拓扑表达所真正“表明并真正暗示”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是不可能的。

拉康在研讨班XXIII第八次会议开始时，对于“实在”这种“排除意义”的东西所要保持沉默的必要性，就显然使他感到了不安：“我今天对你说的唯一借口是…这将是合理的（sensé）。有鉴于此，我不会做我想做的事，即给你一小片实在界（un bout de réel），即实在界的一些奇怪的或结尾的东西。”22如果说这是拉康拒绝放弃的欲望的话，那么这并不是什么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欲望——这不是对可能性的欲望；那种“说出全部”的可能性，可以实现“整体真理”或明确含义的清晰性，而是一种欲望或“去表明的义务” ——表明这种欲望所具有的不可能性的结。这是与欲望的非线性暂时性是相一致的，拉康以批判性的眼光向过去扫了一眼，并焦虑地展望了未来，从而结束了会议：

*我能不能告诉你——这不应该只是一个梦——什么才算得上是一小片实在界（un bout de réel）？…就目前而言，我们可以说弗洛伊德本人除了合理的（sensé）敏感洞见性之外什么也没有产生，这让我很失望。然而，这不是我失去希望的理由，而是我想着有朝一日可以真正做到这一点。23*

拉康曾在研讨班 XVII中指出，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的梦想*”24——弗洛伊德试图通过神话意义的普遍真理来解释性的奥秘。梦境导演了一场与实在的遭遇，但它总是一次错过的邂逅；这就是主体对梦所提供的欲望的实在的间接一瞥所引起的焦虑，主体被唤醒，以便他可以继续做梦：

*没有一种实践比精神分析更倾向于体验的核心，也就是实在的核心。我们在哪里见到过实在界？因为在精神分析的发现中，我们所拥有的是一次相遇，一次重要的相遇——一次我们总是被召唤着去见一个我们无法捉摸的实在的相遇。25*

弗洛伊德创造了一些有意义的东西：通过俄狄浦斯情结，欲望被赋予了意义——性关系中发展和解决的一条自然路径。弗洛伊德已经从实在界中撤退，继续做梦。这就是为什么这项研究的很大一部分将被用来阅读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因为他努力将精神分析实践的基础“从神话转变为结构”26最终，到了纽结的拓扑。虽然鲁迪内斯科努力将拉康神话化，认为在他身上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俄狄浦斯在步履蹒跚，或者看到一个精神错乱的炼金术士的疯狂野心，但他说，我们以前见过他这样的人——像弗洛伊德那样宣称，我们可以理解哈姆雷特，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每一个受困扰的灵魂，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俄狄浦斯王——当然是一个开始，她不愿将他最近与“伟大的难-题（casse-tête）”的遭遇视为忧郁衰老的案例研究或对绝对的虚荣追求，这可能会扭转拉康致力于“从神话到结构”的通道，因此，有必要回到弗洛伊德。

拉康特别热衷于避免弗洛伊德思想在精神分析“教会”手中所经历的屈辱。因此，他高调宣称：“问题就是这样暴露出来的，在于有一个解决方案：哪一个是*消——*一种消解...根据我的博罗米恩结，一个人离开就足够让所有人都自由了，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正确的，但在我的学派（École）里27，我自己也是如此。”那些听了拉康讲话的分析家们被带到了领悟点（point of realising），就像人们在分析结束时所做的那样，给了他们“一小片实在界（Un bout de réel）”。“大他者”——由法律和语言组成的巨大的社会符号网络，被主体认为应该知道解决方案；可重复的、可被意识到的、可传播的和可验证的解决方案——“丢失了”。28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拉康电视首秀的台词的空白处的主题，S（Ⱥ）：带杠（/）大他者（A）的能指（S）。只有不说出“全部真理”，一个人才会“执着于实在”，从而影响（消）解方案（[dis]solution）。普遍谓词（一个连贯的大他者的保证），如俄狄浦斯情结和“父之名”，被降级到了梦般的，或者说脆弱的缝合状态，构成了拉康随着这一解体而开始实施的重要的理论转变，从而消除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区别。我们只剩下拉康的实在，他的死亡之谜，他的（消）解。

对于拉康来说，每个驱力都是死亡驱力，因为主体被驱使去重-寻那个会使这个驱力失效的丢失的对象。然而，驱力是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运作的；使主体恢复到脱臼前的完整状态的对象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它不能被重新找到，因为它是从未被实际找到的：

*这个再寻 [retrouver]的唯一好处就是突出了我所指出的，不可能有任何进展，一个人只会绕圈子。*

*即便如此，或许还有另一种方式来解释没有进展。那就是没有进步，只有打着死亡印记的…*

*死亡驱力是实在的，因为它只能在被认作为（qua）是不可能的情况下才能被思考。这意味着它每次抬头都是不可预期的。接近这一不可能永远不会构成希望，因为这无法预测的是死亡，而死亡的真正根基正是它的不可思索。29*

正如巴迪欧的悼词所暗示的那样，拉康（Lacan） 提出了解决这种僵局的办法，即徒劳无用的僵局，即，在恢复原状的过程中，任何关于恢复整体性（比如，死亡作为[qua]满足）的进步概念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伴随着事件的解除。我们不能说“这个姿态表明并真正暗示着什么”：“像死亡本身一样，它是像谜一样留给我们的。”当拉康指出实在“排除意义（sens）”的时候30，我们也可能会注意到意义（sens）作为方向的另一种翻译:驱力是漂移（dérive）31，没有自然的、固定的或实际的目标（性），如实现性关系，或建立一个了解并传播全部事实的统一的精神分析机构。对俄狄浦斯和拉康这些疲惫的漂泊者来说，“这里没有进步”，“但带有死亡的印记。”

*根据鲁迪内斯科的说法，尽管这一行为诚恳可信，但它不仅构成了对理论的玩忽职守，也构成了对拉康精神分析未来的玩忽职守，使其处于危险的境地：*

*与弗洛伊德不同，拉康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他通过编织他的结和绳子来解散他所建立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拉康的遗产比弗洛伊德的遗产更危险的原因：第一个拉康圈子的精神分析学家什么也没有得到作为遗产，他们得到了解散…更重要的是，他从来没有停止过鼓吹“消散工作”，好像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32*

值得记住的是，弗洛伊德的“遗产”之所以濒临灭绝，正是因为他留下了意义（sens）的遗产；他的继任者继承了他们着手进行“防腐”的方向、制度和知识体系。拉康仍然注意到“一个整合群体的影响，以实验（l’expérience]）预期的散漫效果为代价，当实验是弗洛伊德式的。人们知道弗洛伊德为允许精神分析团体赢得话语，成为一个教会，付出了什么代价。”33当“实验”按照一种不灵活的方式推进时，精神分析的功效就会大大降低坚持作为预测性、规范性解释模板的知识。在这种状态下，精神分析继续存在，但它实际上更像是一种活死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存留。与“话语”的动态性相反，“群体”是一个*整体*；它统一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使它们服务于一个统一的方向，然后被普及。精神分析，除非病人偶然历史的独特性被认为是不可简化的意义（sens），那么只能是“兜圈子”，没有任何进展，虽然它仍然是这个团体的专属领域：“我在无意识的工作范围内。它向我表明的是，除了对我称为言说的存在（parlêtres）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反应外，没有任何真理会对不适做出反应。”34：“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消解。”35

但是…“换句话说，我会坚持下去。”36如果拉康的实验学校（巴黎弗洛伊德学派）本身不再发挥“实验应有的话语效果”的话——如果学派的作用变成了“l’effet de colle”37，用小组胶水般的粘合效果压抑了实践的话——那么就需要进行一次“补偿性的反实验”38。作为“反实验”（例如弗洛伊德事业学院）的组成部分，卡特尔（一个由四个人和一个“加一人”组成的临时研究小组，致力于阅读一部作品或审查一个概念）将避免组织一致性的粘合效应，只要它在两年内解散，并保持消解和更新的工作：“没有进展，只有打着的死亡印记...”除了忠实于弗洛伊德的实验之外，不应对卡特尔和“卡特尔地”实行标准化:“我不会把它们完全化。不，要，完，整。”39然而，鲁迪内斯科认为，这种“消解的工作”作为一个“主要概念”被提倡“并非是一种遗嘱”40。我们认为拉康不会不同意，但这完全是要点:精神分析是一种动态的活动，不是前人遗留下来的圣经戒律的集合。

如果EFP（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这个结被解开了，那么这个结很容易在拉康的《Overture to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Encounter of the Freudian Field（向弗洛伊德领域第一次国际研讨会的提议）》中重新出现在加拉加斯举行的第一届（ECF弗洛伊德事业学院）年会上，拉康主动“总结”了“我和弗洛伊德一直在进行的辩论”，这很有帮助:

*我的“三”不同于他的“三（本我id，超我superego 和 自我ego）”，我的“三”是实在界，象征界和想象界。我是通过……博罗米多结……的拓扑学来定位它们的。*

*我把这个给（donné）了我的学生，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实践中找到方向。但是，他们能找到比弗洛伊德所传下来（léguée）的地形学更好的方法吗？41*

虽然我们将把对拓扑学的优点和（弗洛伊德）地形学的不足之处的更持久的研究留到后面，但让我们在这里仔细注意拉康的用语。弗洛伊德的知识（静态地形是相关的代表）被遗赠（*léguée*），是作为大他者所保证的圣经遗嘱或遗产的一部分。而*礼物*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没有法律、制度或正式的基础。拉康热衷于卡特尔是由读者组成的，而不是学生（徒）：读者可以用礼物为所欲为。因为拉康对读者的明确偏好只出现在种疑虑之前的几段42，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遗留的[bequeathed]）地形和（赠与的[gifted]）拓扑之间的区别与学生（徒）和读者之间的区别有关。前者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后者被迫解释。如果拉康“给”他的学生（徒）“结”，而不是传授知识，如果他提供“消解的工作”——结的形成和解开——作为一个“主要概念”，是为了让他的学生（徒）成为读者——在没有被禁止的意义或方向（sens）的情况下，他们是“在他们的实践中找到自己的道路”的分析家（注意反复提到的特殊性）。

回到研讨班 XXIII，拉康在会上表达了他的欲望，“*给*[*donné*]你一小片实在界，”我们发现他向他的观众展示了一个结，“苏里（Soury）和托梅（[Michel] Thomé）给了（Donné）我一个结。这是我喜欢的博罗米多结。”43这个结（由一个致力于为知识提供不易传播的难-题（casse-têtes）的解决方案的卡特尔生产）是如此的奇特，事实上，拉康派的看法是，它不是由三个封闭的环组成，而是由一个环和两条无限的直线（见图1.2）：

就是这样一个结，拉康选择在加拉加斯*给*他的观众：



**图1.2具有两条无限直线的博罗米结（我们已经提供了该结的一般表示。拉康所说的结具体可以在SXXIII，第100页中找到。拉康最早提出的结和无限的直线是在研讨班XXI，21/5/74。另见：SXXII，10/12/74、18/2/75、8/4/75、13/5/75、研讨班XXIII，第16、22-23、39、67、90、94-97、99、119页）**

*当然，我的结并不能说明全部情况。如果没有它，我甚至不会有机会去了解。在那里，因为，我说的，不是全部（Pas-tout）。并-非-全-部，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我的实践中，我所说的是实在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在我的结中，实在的特征不断地作为一条延伸到无限的直线，即它是预先假定的不闭合的圆。这就是它只能被承认为并非全部这一事实的原因。44*

如果拉康的第二句话（“…把我的方向带到…”）让我们回忆起了必须找到“自己的路”的分析师所面临的挑战的话，那么它还列出了一种品质，这种品质坚持在了这个令人费解的拓扑结构中，并帮助人们“在那里”获得方向：“那里”——在哪里？——“我说，就是并非全部那里。”学究式地提到言说的行为（“我说”）是为了强调不是所有的都出现在言语中。回想起他在电视首秀的那个开场白，拉康总是说真理，但“没有说出全部的真理”。虽然这很难想象——当然，这也是拉康的部分吸引力所在——但这也像由无限的线组成的结和由圆组成的结一样牢靠，因为“环”不能彼此滑脱。然而，尽管这种一致性，这个结仍然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它不能被框定或汇总。在它的组织内部（或外部？——这是无法决定的），仍然有一小片实在界；一个“并非全部（pas-tout）”，它构成并消解了它假想的“全部”，分析师必须“在他们的实践中找到出路”。在这里，这个结体现了分析家反复发现的结构悖论：主体结构的一致性取决于同一结构所不能包含的轨迹。换句话说，分析者通过参考一些不能被理解但也不是直接超越结构的东西来找到并确定他的方向。正如拉康的前两句话所暗示的那样，正是因为“我的结不能说明整个故事”，才能允许他找到自己的方向。面对实在，拉康以一种恰如其分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演讲：“我不会告诉你所有的事情。这是我的信条。”45

显然，当霍根参加1982年这一事件的重演时，神秘的结已经保留了他在拉康的学派和在实验中的地位，但同时也仍然保持着沟通或消化的尴尬。随其后的不是“连贯的重新解释”，而是对拉康试图严格地给一小片实在界以拓扑的解读。

**1.2理论与实在界**

“在他死前三年，在圣安娜医院举办的会议上，一个精疲力尽的拉康出现了，在一系列既像是大祭司使用的深奥咒语（esoteric gnomes），也像数学家使用的零散代数式中，拉康完成了无意识理论的最终形态，他特意强调，言语陈述是绝对有必要的。”46就算拉康是如此小心地选词择句，在以上这段对拉康陈述的简略表征（representation）里头中，拉康依然被误解了。早在十年前，拉康就已警告过他的听众，“对无意识理论的言说确实生产了不少可笑的偏差，尽管我极力避免它，这种偏差已经以‘应用性精神分析’之名大行于世，滥用于何处？滥用在纯艺术方面！”47

言说无意识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在相关研究一片荒芜的情况下，冒着产生肤浅的概述的风险，而最终的工作很可能不被承认为一个坚实的理论体系，拉康思想的旨趣，特殊性和难度可见一斑。此外，如果将无意识变成理论的对象——换句话说，如果将其视为可以在远处思考和设想的“景观”的话——那么它就会变得完全晦涩而非从晦暗中被澄明。（晦涩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无意识是与意识理解相对立的，而且是因为，当无意识被纯粹当成理论对象的时候，它就脱离了实践。这里有两点很重要，就像拉康所提出的：当“我在工作中（dans le travail[即研究无意识]）”48时，如若发现这并非是一个能被旁观者视为“find their way”的拓扑式的分离点的话，我也可以说 “我在研究不能言说之物。”49虽然无意识的工作所呈现出来的“时空转移的可读织物（the spatio-temporal fabric of transference）”似乎没有止境，其褶皱将分析师卷入，不允许其逃离，但在它的上面其实还标有着一个洞，因此这种僵局反倒自相矛盾地使这种无所不包的结构变得不完整了。

为了将自己和临床派精神分析区分开以获得自身的建制和宣传，拉康派理论首先宣称自己为“无意识的理论”，其后在跨学科间宣称自己是支持文本或作者的无意识理论的，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回到被分析者或文本时，精神分析实践最终成为了理论应用的问题。拉康指出，“理论”的理想是“无比详尽的知识”，它将“使我们能够对理论对象的‘全过去和全部未来’进行说明。很明显，这样的理论并未给任何新事物——书写、行动（Wirken）或恰当的言说——仍旧留有认知的空间。理论中的任何事物都不能远离“弗洛伊德的经验”。50对于拉康而言，古典理论的推理性往往只是知识积累和巩固的序幕。“行动”和“经验”之间的相互“新”关系才是拉康在他工作中屡屡强调的东西。正如精神分析理论在文学中的应用只是用来确认精神分析的真理，而不是揭示文学本身的任何新事物一样，在巩固和补全知识（一种已知的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的精神分析临床实践也将极大地局限于实用功效上。其恰恰处于“无意识的运作下”，不是向其所应用的知识，而是要直面“不能言说之物”。

在1978年的会议发言中，拉康为他的研讨班提供了一个异常紧凑的历史陈述，他提出，是为了要“展现”无意识，而非仅仅理论化它，这里，他的“话语”涉及到“清除（脱位）”的过程，这一过程分为两阶段，首先，他勾勒了一幅图景，是有关弗洛伊德著名案例的陈述的。其次，他制作了“一个关于无意识的表述……以数学秩序组织起来”，但最后他也再次强调“它（Ça）只是一种表现”。51在之后的演示中，拉康说“我以……波罗米结的形式呈现这些东西，”52每个环对应于三个“东西”（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中的一个，这三界扭结在一起 ，构成并支持了精神分析学科。 这两种表示方式难道不构成了同一种理论吗？如果不完整地讲故事，被分析者又怎么能允许分析师承担责任呢？

让我们再次回到图1.1，熟悉上面使用的术语和理论知识，或更准确地说，了解理论的表现形式要比单纯将其作为一种学习和应用的知识更为重要，也就是说，要了解这种排序的结构或“数学顺序”有什么作用？这些术语如何相互关联？ 按照这种顺序，什么是可能的和什么是不可能的？什么是结构——换而言之，什么是使之成为原形的最小公理不变式？

这些是理论家还是临床实践者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仍然难以回答，那么这个困难对拉康的演讲有什么启示？ 这种区别能在拉康的拓扑转向中得以幸免吗？

\*\*\*

拉康回忆说，他在1953年的一次题为“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53的演讲中“已经宣布了这些事情”。现在，虽然我们可能会倾向于将此声明理解为一种可疑的尝试，即，拉康试图回溯性地重置“理论的理论”，这是一种具有理论连贯性或目的明确性的历史，一种从有利的角度判断和评估理论本身的元理论，以便产生不仅了解其“整个过去”，而且具有以下特征的“无比详尽的知识”：即，事实证明，它始终被称为“整个未来”。这将消除拉康理论在1953年与1978年之间的重要区别。

在之前，“物”是以宣布的方式被呈现的（用陈述性的语言或手势来表达观点和原则），而这些“物”现在则“以波罗米结的形式呈现”。事物的命名与事物的结构表示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不仅是为完成理论所作的微小修饰，而且是一种试图识别和检验理论本身的局限性的尝试。

拉康在1953年以弗洛伊德的案例研究为依托的演讲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他认为与这些限制的对抗是精神分析所固有的东西：物从一开始就无法逃脱我们，也就是说，在分析中，有一部分我们主体的实在逃避了我们。当弗洛伊德与他的每一个病人打交道时，它都没有逃脱，但是，当然，（虽然）这（其实）完全超出了他的掌握和视野。”54这里的实在界有一个很奇怪的位置，如果它“超出”了意识的“掌握和范围”，那么这个“超出”就不是一个绝对超出明确定义界限的神圣绝对。 如果这个实在“逃脱了我们”，那么这一逃脱的事实本身“就无法逃脱我们”；它仍然是知识的漏洞。它那无法回避的逃逸并不会停止困扰我们，除非它直接消失或不复存在。相反，它仍旧在坚持作为不可能的存在（言说的不可能）。这种不可能性正是它从反面所定义的本质。因此，如果我们要通过返回这些早期著作来提供拉康“理论的理论”的话，那我们只能看到，它只会观察到一个东西试图引起人们所注意的一致性，并呈现出无法理论化的“某个玩意儿”的缺失。正如拉康所说，这个主体的实在“逃离了我们”的事实“一开始就无法逃脱我们”：它的缺席是拉康以及任何分析师的临床实践的基础：“实在界难以被讨论，而这就是我的话语开始的地方。”55

布鲁斯·芬克（Bruce Fink）在他的译者笔记中写道：“实在界（le réel）和现实（la réalité）在日常法语的使用中是经常不加区分的，在这阶段的拉康作品中也是一样”56但是，在本次演讲中，有时 （特别是在上文和下文引用的段落中），就算没有直接点名区别，至少也是在明确建议进行区别的。实在界没有明确定义；它没有进入理论的词典。 它“逃脱了我们”，并且在当时似乎也逃脱了拉康的听众。 正如弗朗索瓦·多尔托（FrançoiseDolto）在演讲后的讨论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总是遇到相同的问题，‘什么是实在？’，我们总是设法摆脱它。57甚至开始通过系词（is）假定一个可把握的存在（being）概念，并提出“什么是…？”的问题，来试图超越，再现或理论化拉康的陈述。

我们还记得，在“清除”行动的第一部分中，拉康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弗洛伊德的几个著名案例，指出“弗洛伊德衡量和评价人格的直接因素不能不影响我们。”58对于拉康来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分析师可能会受到某种“纪律训练”的折磨，并开始讨论性格或精神等诸如此类的各种平庸的名词，尤其是当培训分析处于危急关头时（即最终分析的完成标志着主体从分析人员到分析师的转变）。

*为了成为一个好的分析师，一个人必须要得神经症吗？有点神经症？得有高度神经症？当然不是，如果根本没有神经症呢？归根结底，这是不是还是在引导我们做出一个判断，并引导我们去评价个人的品质呢？换句话说，我们是否依赖于以下所表达的现实（réalité）：一个主体要么拥有正确的东西（l'étoffe），要么他没有，就像中国人所说的那样“或为贤达君子，或为戚戚小人”？这肯定构成了我们经验的局限性。*59

在这里，拉康论断了现实和实在界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前者能够被大他者或者象征界（即允许主体被置于、以法律的方式[道德、理想等]命名和支持的符号的预先存在的范围，例如，“贤达”）所表现或表征，后者则无法被理论所捕获，没有文本可以定义“主体的实在”。实在界不仅仅“构成我们经验的极限”，而且恰恰使这种精神分析经验成为了对极限的经验。只有通过这种体验——一种必然发生在理论界之外的体验——一种*已然知晓*的“任何新的实现、一种行动（Wirken）、一种行为”才能发生。拉康认为，现实不仅是由象征界构成的，也是由想象界构成的。后者赋予差异能指的关系网一种虚幻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允许固定的参照点和身份，如“贤达”来锚定主体。所有的精神分析案例都涉及到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间特定的联系。所谓“物（étoffe）”，或者说，用另一种翻译，织物——并不是某种模糊的本体论物质，如道德精神（moral fibre）之类的东西，而是一个由线和洞组成的结，我们对自己（现实）和那些不能说或理论化的东西（实在界）所说的话都是由这些线和洞所束缚的。这个结“并不能说明整个故事”，而分析师恰恰应该正是从这个失败（而不是从任何应用知识或个性的评价）来进行着手。

在1953年的演讲中，拉康指出，“谁在分析中发挥作用”的问题恰恰“是所有试图制定精神分析实践理论的人所提出的”，这种经验应始终伴随着那些“构成我们经验极限的事物”。60这是他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在研讨班XVI的一段话中（在这之前，拉康已经驳斥过一种说他正在产生一个“无意识的理论”的观点），他提到了“精神分析实践理论（实践）”和“无意识的体验”。61如果，理论最终不能脱离实践——如果“为了解释它，我们首先需要通过工作来证明它的运动”——62如果这个行动（Wirken）“发挥”了主体的实在（无法驯化的不可想象的无意识），那么这个问题成了拉康在他的研讨班上究竟做到了什么，以及他的学派到底有什么价值？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用四个重要的，有些尴尬的却相互联系的点作为本节的结尾，这些要点构成了超出理论范围的“清除”行动的要旨：

目标：

“我只书写...我觉得必须要书写的东西，为的是让这些案例保持在同一层面，才能方便对其进行配对（比较考察）。”63

(2)定义：

“实在界是无意识……[它]是我定义为不可能的东西。无意识就是不可能本身。”64

(3)推进：

“我提出了一些关于朵拉和小汉斯的事情……然后我提出了一些形式……波罗米安结。”65

(4)结论：

“波罗米结是一种书写，这种书写所支持的一个实在。”66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咒语；对维特根斯坦著名禁令的重新表述：

*凡不能理论的，就必须提出。*

正如第（1）点和第（4）点所表明的那样，这种表达是以一种书写的形式进行的，这种书写不在于表达所“不可言说”的内容，而是在于呈现它的结构。

**1.3一致性和外-在（ex-sistence）**

马尔科姆·鲍伊在他的得意著作的最后一章论证了拉康的工作里有“‘理论’的两种不同命运67：

1. *拉康的话语，作为一个欲望的理论是被自身理论的欲望所激活。“欲望的功能是能指在主体中持续作用的剩余物。欲望（Desidero）是弗洛伊德的我思（cogito）*68*。”主体的欲望，更精确地，作为欲望的主体，表现为一种能指上的一致性——因为这些欲望即其所是；主体的整体性和和主体作为激发欲望的存在的整合性因为以下一个能指的存在而变得“不可能”：这便是被拉康命名为对象a（object a）的“一个必要匮乏的元素”*69*。我们将要在下一节详尽考察这些；这里的重点很简单，就是在于拉康的欲望理论是欲望完成的不可能性。欲望的“命运”在于无限的延迟满足。*

*拉康的话语也表现了理论的欲望——对知识的整体性和整合性的欲望，对认识论领域的一个彻底穷尽的欲望。然而，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来论证满足理论之欲望的不可能性：“我一直在言说真理。但不是全部的真理……”理论的欲望与命运在其最终目标中得到展现，无非就是在它无望地试图整体化自己、道尽一切真理的过程中堕入了能指的恶无限：“第一种情况，在对象小a的永恒战斗中——理论通过追逐不可被捕捉的猎物而找到了它的推动力，随之便轻易地消解在无尽的谜语与双关中。”*70

1. *在第二种情况下，临床派精神分析所揭示出的无法解决的结构性悖论以某种方式形成扭结—此悖论中不存在相同的主体性纽结达成统一整体（即欲望的满足），也不能被仿效为欲望的理论或理论的欲望，而是由诸如“波罗米结”之类的拓扑“装置”呈现的——它“使理论家超越了理论的基础，并进入了全神贯注的凝思状态。此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这样的拓扑图式——宏大、成形、无所侧重。 他看到了一系列的模型(a procession of models)，在此之后，更多的模型序列进入了视野。在两种情况下，理论都被置于其自身不可实现性的边缘。”*71

如果说在两种情况下，实现理论命运的形式明显不同（喋喋不休的演说，亦或是虔诚的缄默），理论命运本身的结构形式却是不变的。无论哪种情况，引用鲍伊的最后一章的标题，我们都面临着“无限的理论”所给出的那种令人厌烦的前景；我们的选择是要么拥抱前者，即接受理论是无限的能指游行，要么选择后者，即认为理论是向无限可置换视界延伸的拓扑图形。如果我们把“理论推到其不可能性的限界”，那么它就会止步于此，并陷入自我增殖的循环。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理解拉康的坚持，即关于拓扑结构是决定性地超越理论的“不可能的实在”的书写或表现呢？拓扑如何逃避能指的命运（即无法得到“确定性”，成为无限多个模型中的一个）？对此，我们必须把握传统理论和拉康无限实现的拓扑结构的区别，前者只存在于一个几何平面的地平线上的一个潜在点，在这个几何平面上，符号和“模型”将无尽地前进，最终堕入形而上学的“恶无限”。而拉康的拓扑学则是一种“无限性的拓扑实现”

拉康在1976年宣称：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正是有关在一个外在于我们的身体和形成一个圆圈的物体（或是一条延伸到无穷的直线）之间存在的关系，但是这两者（指圆圈和直线）是等价的。72如果，我们作为拉康“话语奇观”的见证者（即“回到弗洛伊德”事业），想要试图公正地陈述拉康的发现的话，那么我们在讨论的局限性的内部和反对下，就应该暂停对其完全陌生的结果的怀疑，此时恰恰应认真对待其挑衅性的正确诉求，而不是将这一理论轻易地斥之为理论泡沫。由此，拉康拓扑学的本质特征就变得显而易见了，简而言之，当他说无意识确实是一个“绳子”将自己的尾巴咬在一个不可思考和无法想象的“无限点”73上，并对“一个外在于我们的身体”产生了的扭结效果时，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如此而已。无意识是一个拓扑，它的拓扑是一个扭结。如果你还是在这一点上不愿意认同拉康，那么我们也必须坦诚地必须指出，弗洛伊德无意识和扭结之间的确切对等关系就是一种无法通过不精确的基于外观的相似来验证的东西。

拓扑的数学原理与可量化的数量关系无关，而与公理的性质关系有关，因此“使意义（= quantity）取决于了结构（= quality）”74。这种类橡胶几何形状可以承受量化形式上的连续变形（不涉及切割或缝合的膨胀或收缩），而不改变其性质结构。75例如，一个银河那么大的环和一个百吉饼那么小的环在拓扑上是等价的：我们所讨论的特定结构，即，一个完整的，物质性轮廓的洞是保持不变的。在此我们应该回到上一节中提出的观点：对于拉康来说，从命名或计数这些东西（即，实在界、符号界和想象界的界域）到编写其“数学秩序”的转变——也就是说，三界之间的结构关系贯穿着表面的变化过程——是个逐渐进步的过程。拓扑不仅可以显示实在界和其他两界，而且恰恰能精确地显示它们。拉康的三个语域，从被接受的思想、某种印象派似的描述和被误解的引文的迷雾中才能浮现出来，如果一切都按拉康计划进行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追溯性的意义的颁布（imposition of sens）——这是弗洛伊德遗产的特征，因为它们在数学秩序中有着更为确定的基础，它们的定义是由于它们的结构位置和关系。而这里的具体数学秩序是一个结——一个一——当且仅当三界共存时才会显现出来。

拓扑学鼓励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假定等价的正确性。在上面引用的无意识定义中，拉康认为圆和无限的直线是等价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尽管这两个图形看起来完全不同，但只要波罗米结的基本枢纽性质能够持续下去，无论它是由闭合环还是由无限长的绳索组成，它们的结构效果都是完全相同的。然而，我们不应该因为拉康承认圆和无限线的拓扑等价，因而认为他对后者的引用是某种动机不足的“多余”。它的引入具有两个功能：首先，它用拓扑特有的方式明显地打破了传统的摹拟或者是隐喻表征的逻辑。就波罗米结的数学秩序而言，无限直线虽然看上去不 “像”是一个圆。但就其（作为结的组成部分）构成一组等效的结构关系而言，它是一个圆。其次，这是某种拉康付出巨大努力的表现，他不是以理想的，封闭的整体形式来呈现精神分析主体，而是在作为一个复杂的实体来抗拒表象，而又不会落入被神学家（例如精神或灵魂）所抛弃的不可言说的绝对。我们还记得，实在界既不是结构的组成部分，也不是结构之外的直接对象。在这里，无限长的线条既是“实在界特征”，也是“并非全部”，是扭结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数学秩序不仅在实在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也取决于实在界。无论是拉康在谈论“日常用品”还是弗洛伊德主体的时候都指出：“人们不会制造闭合的弦环。”76一个弦环是由一条首尾两端打结的线构成的。他的观点很简单：为了使弦构成的环（或圆圈）有一致性，必须打结。尽管我们认为自己是封闭的，一致的和有自我意识的个体，但弗洛伊德的伟大见解是，我们的主体性具有不可还原的独特性，这归因于我们的自我形象或身份所排除的被压抑的联系。我们对“有意识的认知”进行“想象的抽象”的能力“太弱了”，以至于当被要求直观地描绘一个闭合的环（或者想像自己）时，构成性的“结被排除在绳索之外，作为一致性的残余。”77“整个的实在界逃脱了我们”，然而，在这种奇怪的结构悖论中，我们无法逃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转向了精神分析家；为了摆脱这一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挽回的结，就错误地相信一个人最终将能够“了解自己”并成为一个始终如一的存在。拉康在后期对分析的终点和目标的刻画中，并不是要消除决定性的扭结，而是要解开并重新系结——任务不是消灭实在界，而是修复我们与实在界的关系。

尽管无法用图像描绘出一条“闭合的”无限的直线，但它仍然是一种有效的现实，并使得扭结的形成成为可能（即在“无限点”处发生的屈曲，通过确保结的节点质量性而使结成为了可能），这在拉康意义上恰恰是实在的，不管是实际的还是不可能的：“实在界……存在是不可能的。”78如果用拉康喜爱的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与其说是“存在”（exist），不如说是以无神论的方式“外-在”（ex-sist），它既是有效的存在，又是不可重复的模糊性，既是内在的又是不可企及的。因此，这种打结所在的外-在的“无限点”不同于鲍伊对拉康拓扑结构的表征所基于的那种潜在的，虚拟的，或更直接地说，不存在的无限。虽然不能直接理解它，但它是具有效果的，并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效果来认同它。拉康的拓扑结构“在无限中有效地构成了扭结”79：“直线该如何与圆等价？显然是因为它们是处于扭结中的结果。这是波罗米结的结果；这是对效率（efficiency），对有效性（effectiveness），对现实（Wirklichkeit）80的一种依赖”——当分析家依靠象征秩序建立某种“象征经济体系”（即，基于相似和差异的外观对对象进行分类）时，所有这些都会受到威胁，而不是仅仅会将结构视为一组定性关系那么简单。

正如拉康经常争论的那样，无意识并没有形成弗洛伊德本体论的基础。它不是一个一致的存在，而是被任何对一致性的诉求所排除的事物：“扭结并没有构成绳索般的一致性……它相对于绳索元素，相对于一致的绳索而外-在。”81然而，“逃脱我们”的实在本身是无法逃脱的。 它把自身强加给我们：“没有任何一致性是不被扭结支持的。 扭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所强加的实在观念本身。”82在这种表面矛盾的陈述中，我们了解到实在界既是我们最根本的东西，又是与我们的自我观念最根本不同的东西：“无意识的外-在。”83 自我（理论化的现实或者是想象的一致性）和无意识（无法理论化的，外-在）“属于”同一主体，但却是绝对不相容的； 他们不能作为一种思想，知识或存在而获得联合。

但是，结构上的等价无法被直接表征；我们要么画一条直线，要么画一个圆，你不可能同时画出两者。因此，任何对扭结的表现都总是无法捕获其客体，这通过一系列失败而成功地被证明，扭结是一种外-在，而无法被想象带入到存在。没有理想的扭结形式，没有基友一致性又是外-在的、既具有限性又具有无限性的完美的象征。 这使拉康的拓扑学演示总是暂时的和动态的。它使他的思想避开了弗洛伊德的桎梏。换句话说，恰恰在表征失败的时候，演示发生了:

*扭结不是一个模型。扭结的形成并不是因为想象界，也不是因为表征。此外，它的特点是它逃避了想象界，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表征一个，我就把它划掉···这样的事实表明了扭结是多么难以被模型表征···实在和现实之间是有区别的，扭结正显示了这一点。*84

就像精神分析的主体一样，每一个结，在其出现的同时，都被作为一个可证明的表征上的失败而加以划杠和抹去。这样的论证活动摆脱了象征主义和模型论证的沉闷和昏昏欲睡，使拉康能够像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的《全能侦探（Dirk Gently[一部英剧]）》中那句精彩台词所说的那样，“抓住不可名状本身，看看我们最终有没有办法消除它”85——也即是说，将弗洛伊德无意识呈现为了实在。当然，任何这种尝试都并不等于性关系的书写。

\*\*\*

尽管拉康是出于好意，但对于那些更了解拉康理论（即无意识有类似语言的结构）的读者而言，上述无意识的定义听起来还是有点不寻常；尤其是对于那些通过文学理论认识到拉康的人来说。在拓扑学上的无意识里，我们可以立即注意到，其不仅脱离了对相似性的依赖——它已经不再像语言，而是“精确地”成为了这种拓扑结构——同时也摆脱了诗化无意识的不可否认的诱惑。的确，如果（拉康论证的）拓扑无意识的“排斥”读者期望直观的可读性，那恰恰是因为无意识无法还原为由不精确的替代和类比产生的任何隐喻意义。如果这可能让我们一不留神误认其具有本体论上的正确性的话，那么该种本体论恰恰只是同义反复地说“它是其所是”，而没有其他，这里要记住的是，无意识是外-在的实在，而不是确实的存在。的确如此，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无意识的产生恰恰是由于不可能在语言中产生一种自我认同的同义反复。

为了呼应罗曼·雅各布森的论点，语言学家诺曼·乔姆斯基通过将他著名的命题（“Colou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打上了语义上的无意义，而使其忽略了语言隐喻的共鸣，拉康在研讨班XII中指出，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应该进行文体练习，并将其视为无意识本身的极佳描绘。毕竟，“诗人”拉康说，这不正是精神分析在证明“sleep（is） accompanied by some fury”这一事实吗？难道我们不能够想象到无意识是由“想法……（或）其褪色的绿色……像从地狱召唤出来的阴影又回到阳光下，想要喝血以恢复其颜色的思想”86组成的吗？不过拉康依然认为，尽管这里的机智值得称赞，但仍是“完全愚蠢的”，因为“无意识与这些隐喻意义无关。”87此外，“在有意义的语法链中寻找意义是一项“无用的徒劳”88，因为人们陷入了一种没有决心的诠释性的恶无限，这恰恰在朝着鲍伊的那种平面的可移动视界前进，并且弗洛伊德也是极力避免它的。一个人试图寻找的意义是永远被推迟的。拉康也许暗示了德里达为何能如此有力地发起当代的辩论，他认为“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周围条件、处境，最重要的是对话的处境，（这样）我可以让（乔姆斯基的）句子表达我想要的任何意思。”89与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意义库相反，应该被孤立的恰恰是“那个支撑点，那个脐（navel），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它）消失在了理智之下。”90尽管每一个细节都无法最终理解，然而，这一“支撑点”是有效的实在。精神分析解释趋向于将脐或结解释为无意识的外-在的支撑点，但，这却被寻求确定性或集体意义（例如荣格的普遍象征）的尝试所掩盖。所谓的“无限点”，也就是主体的结形成和消解的地方，是不能通过通过无限的意义替换的方式来达到的，这种错觉的产生恰恰是由于还相信探寻意义的意义会拨开实在的迷雾。

由于拓扑的数量意义/大小可以变化到无穷大，因此很容易觉得拓扑对精神分析家产生了什么奇怪的影响。但是，正如拉康极力指出的那样，“像橡胶一样（好变形[in rubber]）并不意味着其中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什么…能让我们解开彼此相连的两个环，即使它们是有弹性的……弹性的逻辑并不是完全自由的。”91拓扑结构的无限变形受到不变性和不可约性的限制，拉康称其为“结构的实在”92。正是这样，一个结构不可能既失去，又保持它原来的结构。只有“这种结构概念”所构成的极限，与作为社会建构的，无穷无尽的“技巧”（纯粹的象征界）或整体而连贯的领域（纯粹的想象界）的任何退化的结构感觉相对，才能够赋予拉康那个被谴责为完全自由的，使精神分析成为永无止境且无效的“骗局”的，“逃逸的希望”——“希望”，即“到达实在界”93的希望。拓扑结构，并不是使狂躁的自由解释合法化，实际上，这有助于将实践集中于实践，并超出西西弗斯式的寻求意义的（源于自由或恶无限的影响的）绝望。

在上一年的研讨班的一个会议上（俗称“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我们的”），在演讲后，“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对我的意思有所了解——无意识有类似于语言的结构”94，拉康在谈到他回归弗洛伊德的利害关系时，用了一个他稍后会驳斥的比喻——它本身就是《梦的解析》中的一个比喻，弗洛伊德写道：“如果我可以用一个明喻——沉睡和持久的无意识路径等待着刺激，就像史诗《奥德赛》中，在地下世界栖息的鬼魂一样，一旦尝到活人的鲜血便会重新苏生。”95我们注意到了“脐”——一个臭名昭著的弗洛伊德隐喻，被拉康转化为一个拓扑学实在，它是一个“拓扑结构固有的”“反概念的”“洞”，分析实践应该孤立这个“通向梦幻的脐”或“阴影世界……而不总是能够把它们带到阳光下”96也就是说，拉康也坚持认为“自从弗洛伊德以来，精神分析经验的发展只表现出对差异中出现的东西的蔑视。我们还没有……用鲜血喂养从它身上显露出来的阴影。”97拉康试图在弗洛伊德中保存的，正是这个无法解释任何“隐喻意义”的洞，这个保存本身就被编撰成与无意识——拉康后来坚持的“隐喻意义”完全相同的“隐喻意义”——“无关”，这与拉康对无意识的隐喻和拓扑呈现之间的摇摆不定有很大关系。

“认为这不是我：从第一个含糊其辞的方法来看无意识的呈现方式”98这样模糊的定义，事实上，这个词本身（无意识）的问题恰恰在于它是消极的，因此，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允许了一些误解。例如，“一个不是我的思想”可能同样被想象成本能，或者是某种存在于不受语言影响的生命之中东西。拉康在1973年评论说：“弗洛伊德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词），但也没有必要再回去研究它了。”他补充说，无意识是“非常精确的东西。除了言说的存在以外没有无意识。”99在这里，我们应该重申严谨性和连贯性之间的区别：暗示无意识是“精确的事物”，并不意味着它是可以系统化的事物。的确，无意识是一种“精确的事物”，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无法系统化的方式；它是以每个个体“说存在（parlêtre[拉康自造词]）”无法连贯地“说出全部”的特殊方式不可预测地出现了。

1976年，拉康克服了这种沉默，重新提出了自己的定义：“无意识（inconscient）与昏迷无关。为什么我们不……用l'une-bévue（唯一错误）100来翻译它呢？”这里显示了一种奇怪的精确——一种缺乏一致性的严格性。否定前缀（in）已被一个积极的前缀（une）所取代，这在分析者言语的不精确性中可以被准确地检测到；这是由于积极意义的失败（唯一错误）而产生的否定，被语言科学误用。的确，这种精确性只产生于拉康对语言固有的不精确性的利用；in和une之间谐音的模棱两可。拉康的重新定义并没有使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在现实中活的某种积极的存在（existence），而是在诊所中反复证明了这种外-在，并在《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得到了有力的说明。对于拉康来说，“无意识的体验”恰恰是通过“言说的体验”来实现的。101

在同一年（1976年）内，拉康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提供了两个“定义”（如唯一错误和结），这两个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都有明显的先例（诙谐[后在拉康处更多在妙语处]和脐），但都被隐喻含义所模糊了。“沉默的”扭结（“它[Ça]只是一个呈现”102）和“笨拙的”唯一错误（“ça parle”103）如何等效？因此，我们必须再问一次，拓扑与精神分析到底有什么关系？

\*\*\*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拓扑学是如何让拉康呈现并展示一种结构的悖论——正是这些悖论将精神分析学科定义为了有别于那些意识的自我理解知识，以及将看到时-空拓扑学，如莫比乌斯带，是如何以一种不可比拟的强制力搅扰了带来谬误的直觉。

**1.4注释**

1. 帕特里克·科尔姆·霍根，“导论：拉康的压抑”，来自《批评与拉康：关于语言、结构与无意识的论文和对话》，帕特里克·科尔姆·霍根与拉里塔·潘迪特编（伦敦：佐治亚大学出版社），第xiv页。
2. 霍根，第xiv页。 除另外声明，所有斜体化均为我自己的改动。
3. 雅克·拉康，《电视/对精神分析建制的挑战》，德尼·奥里耶，罗萨琳·克劳斯，杰弗里·梅尔曼，安妮特·米切尔松译（纽约：诺顿出版社），第3页。
4. 一个将垃圾桶（*poubelle*）和出版合在一起的双关。
5.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7），第xx页。
6. 马尔科姆·鲍威，《拉康》（伦敦：丰塔纳出版社，1991），第12~13页。
7. 雅克·拉康，《选集》，布鲁斯·芬克译（纽约：诺顿出版社，2006），第263页。
8. 大卫·梅茨格，“解释与拓扑结构”，来自《拉康：拓扑学地说》，埃丽·拉格兰与德拉根·米拉诺维奇编（纽约：他者出版社，2004），第134页。
9. 雅克-阿兰·米勒，“数元：拉康教学中的拓扑学”，来自《拉康：拓扑学地说》，埃丽·拉格兰与德拉根·米拉诺维奇编（纽约：他者出版社，2004），第35页。斜体字为原版就有。
10. 研讨班XXIV，16/12/76
11. 研讨班XXII，13/5/75
12. 研讨班XIII，8/6/66
13. 霍根，第xiv页。
14.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雅克·拉康：其一生之梗概，其思想体系之历史》，芭芭拉·布雷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7），第309页。
15. 雅克·拉康，“在北美大学的研讨会：耶鲁大学：坎泽研讨班”，非官方，杰克·W·斯通译，第2页。《就是说》，第9页。
16. 详情请看雅克·德里达，“真理的信使”，阿兰·巴斯译，来自《被盗走的爱伦·坡：拉康，德里达与精神分析阅读》，约翰·P·穆勒与威廉·J·理查德森编（巴尔迪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第173~212页。
17. 研讨班XXIII，第26页。
18. 来自卢迪内斯科的引述，《雅克·拉康》，第366页。
19. 卢迪内斯科，《雅克·拉康》，第366~367页。
20. 阿兰·巴迪欧与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雅克·拉康，过去与现在：一次对话》，杰森·E·史密斯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4），第36页。
21. 巴迪欧与卢迪内斯库，《雅克·拉康》，第53~55页。
22. 研讨班XXIII，第100页。
23. 同上，第109页。
24. 研讨班XVII，第117页。
25. 研讨班XI，第53页。
26. “从神话到结构”是《研讨班XVII》第8部分的标题。详情请看研讨班XVII，第118~132页。
27. 拉康，《电视》，第129页。
28. 同上，第134页。
29. 研讨班XXIII，第105~106页。
30. 同上，第102页。
31. 同上，第106页。
32. 巴迪欧与卢迪内斯库，《雅克·拉康》，第60页。
33. 拉康，《电视》，第130页。
34. 同上，第133页。
35. 同上，第130页。
36. 同上，第130页。
37. 研讨班XXVII，11/3/80
38. 拉康，《电视》，第130页。
39. 同上，第133页。
40. 巴迪欧与卢迪内斯库，《雅克·拉康》，第60页。
41. 雅克·拉康，“1980年7月12日，加拉加斯，弗洛伊德领域第一次国际性会见的序曲”，阿德里安·普莱斯译，《喧闹》，第6期（伦敦：NLS出版社，2011），第18页。
42. 拉康，“序曲”，第17页。
43. 研讨班XXIII，第100页。
44. 拉康，“序曲”，第19页。
45. 同上，第20页。
46. 雅克·拉康，“1978年11月10日，圣安医院，在丹尼克教授的讲座上”，《弗洛伊德协会公报》，第7期（1984年6月），第3页。
47. 研讨班XVI，4/12/68
48. 拉康，《电视》，第133页。
49. 研讨班XXV，20/12/77
50. 研讨班II，第222页。
51. 拉康，“在丹尼克教授的讲座上”，第3页。
52. 同上，第3页。
53. 同上，第3页。
54. 雅克·拉康，“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来自《父亲的名字》，布鲁斯·芬克译（剑桥：政治体出版社，2013），第5页。
55. 雅克·拉康，“对歇斯底里的评论”，非官方，杰克·W·斯通译，第5页。
56. 布鲁斯·芬克，“译者注”，来自雅克·拉康，《父亲的名字》，布鲁斯·芬克译（剑桥：政治体出版社，2013），第98页。
57. 来自拉康对弗朗索瓦兹·多尔多的引述，“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第49页。
58. 拉康，“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第5页。
59. 同上，第6页。
60. 同上，第6~7页。
61. 研讨班XVI，4/12/68
62. 拉康，“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第7页。
63. 研讨班XI，第xli页。
64. 拉康，“在丹尼克教授的讲座上”，第3页。
65. 同上，第3页。
66. 研讨班XXII，17/12/74
67. 鲍威，《拉康》，第196页。
68. 研讨班XI，第154页。
69. 同上，第154页。
70. 鲍威，《拉康》，第195页。
71. 同上，第196页。
72. 研讨班XXIII，第129页。出于某些原因，“justement”在翻译时被省略了。
73. 同上，第23页。
74. 亚历山大·鲁平，《今日的拉康：精神分析、科学、宗教》（纽约：他者出版社，2004），第24页。
75. 拉康对分析师应该些微的还是非常的神经质戏仿式的不确定正是量化思考的智识死胡同的一个例子。
76. 研讨班XX，第127页。
77. 研讨班XXIII，第51页。
78. 研讨班XXII，13/5/75
79. 同上。
80. 同上，8/4/75
81. 研讨班XXIII，第51页。
82. 研讨班XXII，15/4/75
83. 拉康，《电视》，第28页。
84. 研讨班XXII，15/4/75
85. 道格拉斯·亚当斯，《全能侦探》（伦敦：潘出版社，1988），第150页。
86. 研讨班XII，2/12/64
87. 同上。
88. 同上。
89. 同上。
90. 同上。
91. 来自托尼·休斯的引述，“圆环面——一个引论”，《字符：爱尔兰拉康派精神分析期刊》第43期（都柏林，2010），第82~83页。
92. 拉康，《电视》，第37页。
93. 拉康，“对歇斯底里的评论”，第4页。
94. 研讨班XI，第20页。
95.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一部分），来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标准版》，第4卷，詹姆斯·斯特雷奇译（伦敦：精品出版社，2001），第249页。
96. 研讨班XI，第22~23页。
97. 同上，第32页。
98. 研讨班XIV，18/1/67
99. 拉康，《电视》，第5页。
100. 研讨班XXIV，14/12/76
101. 拉康，“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第9页。
102. 拉康，“在丹尼克教授的讲座上”，第3页。
103. 拉康，《选集》，第571页。

**西方负典编译组 译 本章加一小组成员 Jack Cade 本章讨论小组成员 Will**

**Va-11 Hall-A Kostrubonko**

**DEL。**

**弥**

1. 1 ©作者2017W.格林希尔兹，书写着主体的结构，帕尔格雷夫·拉康系列, DOI 10.1007/978-3-319-47533-2\_1 [↑](#footnote-ref-0)